

李自成

传

以“迎闯王，不纳粮”为号召，开仓济贫，尊贤礼士，赢得民心，众逾百万。
五溃明军，建国大顺，推翻明王朝，登上胜利高峰。
兵败山海关，形势急转直下，放弃北京，
退出西安，流落江南，销声匿迹。

赵波◎著



《中国名人大传》
ZHONGGUO MINGREN DAZHUAN

李自成^①

赵波◎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自成传/赵波编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11
(中国名人大传/马道宗主编)
ISBN 978-7-5502-2159-8

I. ①李… II. ①赵… III. ①李自成(1606~1645)—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3186 号

李自成传

编 著:赵 波
版式设计:东方视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5 印张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2159-8
定价:29.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64243832

前言

李自成（1606—1645年），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其祖上皆务农，自幼家贫，以替人牧羊为生。因上不起学，故识字不多，长大后曾到银川当过驿卒。

明朝末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因裁驿卒而失业，又因借贷被辱，遂投奔活动于四川的不沾泥张存孟。后因张存孟败降，自为一军。不久，李自成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自此，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崇祯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

崇祯十三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纷暴动。李自成起义军针对明朝土地高度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崇祯十四年初，李自成起义军攻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此后，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大败明朝陕西总督孙传庭的军队，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了河南全省。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崇祯十六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下湖北襄阳，改襄阳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

十月，攻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同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大顺中央政治机构在襄阳、西安两次建制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委派官吏。同时，李自成继续分兵略地，然后在新占领的地区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层政权。此时，大顺政权的北方劲敌只剩下驻防在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了。后李自成进攻吴三桂失利，不得不败退回北京。

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称帝后南下。同年九月至



九宫山地区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显示了中国农民反抗压迫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苦难年代	(1)
一、政治腐败	(1)
二、义军四起	(4)
第二章 自成出世	(9)
一、出身贫寒	(9)
二、拜师学艺	(10)
三、自谋生计	(13)
1. 受雇富绅	(13)
2. 应募驿卒	(14)
3. 祸起李氏	(14)
第三章 揭竿而起	(18)
一、投奔杨肇基	(18)
二、加盟农民军	(19)
三、明廷剿抚并施	(21)
四、势力壮大	(24)
1. 崭露头角	(24)
2. 剿杀农民军	(27)
3. 移师中原	(28)
第四章 荥阳大会	(31)
一、兵分两路	(31)
二、陕西告急	(34)



李自成传

三、转战河南	(36)
四、荥阳大会	(38)
五、凤阳之战	(39)
 第五章 号为闯王	(44)
一、威望大增	(44)
二、镇压农民	(47)
三、联军作战	(49)
 第六章 连遭败绩	(55)
一、九部入川	(55)
二、专用杨嗣昌	(57)
1. 制定作战方案	(58)
2. 先抚后剿	(59)
三、损失惨重	(65)
四、积蓄力量	(68)
 第七章 东山再起	(73)
一、张献忠复叛	(73)
二、三家合兵作战	(76)
三、杨嗣昌出京督师	(79)
 第八章 占领洛阳	(83)
一、明廷加征练饷	(83)
二、天灾人祸不断	(87)
三、官逼民反	(91)
1. 队伍壮大	(91)
2. 招纳文士	(93)
3. 攻占洛阳	(95)
 第九章 连战开封	(100)
一、首攻开封	(100)
二、大败明军	(102)

三、永宁会师	(105)
四、二攻开封	(107)
1. 制造声势	(107)
2. 激战开封	(109)
五、鄆城之围	(114)
六、襄城之战	(116)
七、三攻开封	(120)
1. 扫除障碍	(120)
2. 围而不攻	(120)
3. 朱仙镇大捷	(122)
4. 水漫开封	(123)
八、痛击孙传庭	(127)
 第十章 建制称王	 (131)
一、攻占襄阳	(131)
二、争夺郾阳	(135)
三、巩固地位	(137)
四、襄阳建制	(142)
五、覬觎皇位	(144)
 第十一章 建元永昌	 (148)
一、角逐中原	(148)
二、鏖战陕西	(153)
1. 潼关大捷	(153)
2. 占领西安	(154)
3. 巩固后方	(156)
三、编练童子兵	(158)
四、建元永昌	(161)
五、清兵入犯	(164)
1. 攻略京师	(164)
2. 进犯辽东	(169)
六、明廷危亡	(177)



第十二章 进军北京	(182)
一、王朝末日	(182)
二、决议迁都	(186)
第十三章 北京称帝	(196)
一、皇室凄凉	(196)
二、命归煤山	(201)
三、闯王入宫	(206)
四、令促称帝	(209)
第十四章 大顺哀歌	(218)
一、处处被动	(218)
二、固守关中	(220)
三、连遭失利	(224)
1. 潼关之战	(224)
2. 放弃关中	(226)
3. 亡命湖北	(228)

第一章 苦难年代

一、政治腐败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农民大起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都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朽。明朝末年之所以出现了李自成起义，其主要根源是从万历皇帝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引发的。

在万历年间，初期只有张居正当政时治理得还比较好。他推行多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实行，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国势不断增强。张居正死后，朝廷的腐败倾向迅速发展起来。腐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皇帝不理政事；二是用大量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对全国实行史无前例的大搜刮；三是朋党之争日趋激烈。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多年，居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在诸事都需皇帝“宸断”的封建时代，皇帝整天宴居深宫，不见朝臣，势必导致人心涣散，政事荒废。万历皇帝十分宠爱郑贵妃，就好比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一样，整日于宫中宴饮，过着深居简出、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大臣三番五次地请他出朝，他都谎称有病，加以拒绝。在宫中他却是“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他的左右稍有不慎，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臣下的奏章他不去处理，有些大臣看不惯皇帝的行为，便上一封辞任的奏疏，不论准否，即挂冠而去。各衙署有很多官职缺额，他也不给增补，倒认为少一份官职就可以少支出一份俸禄。新考中的进士得不到委任，犯人也无人去及时审理，监狱里边长满了青草。这种怠政之风很快蔓延开来，上行下效，使得明政权处于止而不前的状态。各级官吏更是趁势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损公肥私。

万历皇帝还是一个贪婪成性的金银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任命宦官为矿监、税使，对全国进行疯狂大搜刮，许多工商业者和普通百姓因此而倾家荡产。各地时常发生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全国哗然。



万历皇帝不仅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喜欢她的儿子朱常洵，他一心想废掉皇长子朱常洛，立朱常洵为皇太子。朝廷中大臣围绕着拥立皇储的“国本”问题明争暗斗，各植党羽，水火不容。所以，明后期的“党争”问题便愈演愈烈，直到国家灭亡。特别是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专权，东厂特务横行不法，气焰嚣张。一些无耻官僚趋炎附势，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到处建生祠，甚至呼魏忠贤“九千岁”、“九千九百岁”。他们勾结为“阉党”，残害东林党人，想贬就贬，想杀就杀，朝政渐渐破败不堪。崇祯皇帝继位后，开始还想大有作为，除掉了魏忠贤，定阉党“逆案”，朝政为之一振，大有复兴之势。只是好景不长，崇祯皇帝又重新开始起用宦官，门户之争或明或暗不停地进行。有些忠臣即便想为国尽力，在那种乌烟瘴气的形势下也难有作为，甚至含冤而死。

辽东女真的兴起是造成明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女真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崛起，接连不停向明朝军队发起进攻。明军节节败退，损失十分惨重。到崇祯皇帝继位时，辽东绝大部分已被清军占领。辽东战局成了满朝瞩目的头等大事，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清军还时常破关而入，入塞南下，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恐慌，崇祯皇帝只得号召全国各地兵马“勤王”。崇祯二年（1629年）底清兵内犯，李自成就曾经作为勤王兵由甘肃入卫。为了对付辽东事变，明朝廷不得不增兵加饷，这就使得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本来明后期老百姓的苦难已经非常深重，百姓已忍无可忍，到处发动武装反抗。这种对老百姓加派等同于火上浇油。各种加派让国家的元气大伤。正像杨鹤向崇祯帝奏言所讲，“加派频仍”，使“小民元气伤”；由于连续不断战争，明军屡遭失败，“封疆之元气伤”；朋党相互倾轧，加害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明王朝就如一个“重病初起”的病号一般，应削减加派，以加强元气。崇祯帝与朝中大臣都认为杨鹤讲的有理，但加派还是照常征收不误。为了镇压烽火四起的农民暴动，明廷除加派“辽饷”外，还加派了“剿饷”和“练饷”。这等于是另一轮的火上浇油。如此恶性循环，老百姓的苦难越来越深重，明王朝也由此一天天土崩瓦解。

此时的官场也已非常黑暗，各级官吏完全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官员利用行贿升官，升了官之后反过来再更多地贪污受贿，上下都是如此。在崇祯帝刚刚即位之时，给事中韩一良就曾向崇祯帝痛陈此事：

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赏？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



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尤然，余可推矣。

以上所描述的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状况。形形色色的加派已把老百姓逼得山穷水尽，再加之各级贪官污吏巧立名目的搜刮，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明朝后期，国家的财政情况基本上陷于崩溃，只能一再“加派”，使得民穷财尽。各级官员借加派之风，中饱私囊，乘机搜刮百姓，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如此，整个国家的百姓完全陷于困苦之中，而陕北最重。由于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雨量稀少，农作物产量极低。上面加派是按亩征收，不管土地肥瘠。陕北一带土地比较开阔，加派的负担比其他地区要重。加派都是征收银两，而陕北的工商业比东南沿海地区落后许多，用粮食换银子十分困难。这也无形中增加了当地百姓的负担。陕北属边防要地，驻扎的军队特别多，老百姓分摊的徭役也特别重。这里的军事长官多是阉党成员，克扣军饷十分严重，竟然积欠士兵的银饷多达三年之久，因而经常激起士兵哗变。这从另一方面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明末水利失修，大大减弱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崇祯皇帝曾问身边的大臣：“水利为什么不修？”大臣答曰：“修理需要钱粮。”崇祯帝以百姓“穷困已极”，不便再“扰民”，便把修水利的事慢慢放下。时间一长，遇到大旱，灾情就显得非常严重。当时留下了很多有关饥荒惨状的描述，即便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

崇祯二年，原籍陕西的官员马懋才上奏，陈述陕西饥荒的状况。老百姓先是采食山间蓬草，继而剥树皮为食，后来又掘食山中的青叶石。食青叶石的人没几天就会下坠而死。后来，小孩子一出门就不见踪影，听说是被人吃掉了。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饥荒图！老百姓的日子已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朝廷还要一再加派，“严为催科”，最后只能把老百姓逼上造反的道路。

除了明廷向百姓的加派外，各级军政部门还有名目众多的临时性摊派。《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孙承泽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就曾经讲道：“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买健驴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日后作何销算，惟曰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还借此暗中加派。由于这种毛贼太多，并且贪心太大，因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负担和苦难就更加严重。



没完没了的搜刮民财迫使大批农民逃亡。地方官为了征购足够数额，他们还制订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一户逃跑则由其他九户补足，二户逃跑则由其他八户补足，九户逃跑则由所剩下的一户补足。这样一来，更造成全村的农民逃散一空。他们毫无目的地从这村逃到那村，由这县逃到那县到处流浪。

身强力壮的人还可辗转就食，老弱病残的人及妇女儿童只能坐以待毙。人们出于求生的欲望，凡是可以吃的东西都找来充饥，不论吃下去的结果怎样。其中有些老百姓吃观音土、青叶石，也只能延续几天的生命。有史料记载，当时豫西的老百姓有的争食雁粪。最让人目不忍睹的是，在北方地区到处都有人吃人的惨状。有人公开在集市上买卖人肉，“每斤价钱六文”。还有人在家里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的人饿晕在路上，立刻就有人割他身上的肉吃。偶尔有人呵斥制止，拿刀割肉的人便说：“我不食人，人将食我。”说者坦然，恬不为怪。一个进京赶考的举人发现，一个妇人一边烹煮小儿，一边哭。他上前去问道，女人回答说：“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饥耳。”这种悲惨的情景一直在这个举人的脑中出现，很长时间吃不下饭去。

吴伟业在崇祯时任翰林院编修，入清之后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就详细记载了一些人吃人的事例：崇祯七年，“永宁民苏倚哥食父母”；南阳县贫民百姓郭廷玉的老婆霍氏，“以母而食女”；山西闻喜县的杨雷，“以父而食子”；张河图等十三人“杀人母子而并食”。他还写道，黄河北“数千里白骨纵横，民父子相食”。这种凄惨的图景实在是催人泪下。

二、义军四起

正因这样，才迫使农民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大规模造反运动。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也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

那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恐怖的传说及预示着不祥的征兆。甚至有人向崇祯帝上书，说“崇”字不吉利是“山”压“宗”，应把它颠倒过来，把“宗”写在上面，把“山”写在下面，立刻能改变命运。连草木虫鸟好像也出现妖形。河南的草“生战斗状，有人马形”，都像“披甲执矛，驰驱纠结”。山东商人去淮南买卖花豆，“及出卖，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另外，花草树木好像都与过去长得不同，都长有妖形。许多鸟似乎也出现了怪样。在崇祯六、七年间，凤阳突然发生“恶鸟数万，兔头，鸡身，鼠足，”肉能当食吃，但如有人一摸鸟骨立马便死。



崇祯二年，北京宣武门外一百姓家喂养了一只白鸡，重四十斤，一个孝廉（明清两代对举人的雅称）看到后，说这鸡长的不象鸡，而是鸛，“所见之处亡国”。看似很平常的事，在崇祯时就会被议为不祥之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全国上下已对明王朝完全丧失了信心，一场大的社会动乱已经来临。

在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往往是由于诸多原因汇合的结果。明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以陕西为中心，除了以上诸多因素外，还与当时裁减驿卒和勤王兵士的哗变有关，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农民军中的骨干。

最初，设置驿站是为公务往来便利而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一般官员不能私自利用驿站。这一制度在初期能够严格执行，到了后期几乎已无制度可言。官宦人家往来道路，任意役使驿卒，不仅要为他们准备车马等交通工具，而且还常常受他们的敲诈勒索。驿站的人力物力原本无几，对这些人无尽的勒索难以应付。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暗中克扣驿站的经费，使驿卒贫困不堪，甚至连驿站的马匹都无法供养。明末史籍中有许多瘦马走死道旁的记载。有的史料很具体地说到克扣驿站经费的情况：“安定站银五万有奇，每发不过一二千金。县令例扣四百，余始分给驿所。”依此推算，驿站只能得到应得经费的百分之三四。这就可以想象驿站是如何的困苦不堪了。在几乎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整顿驿站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

崇祯二年，崇祯皇帝按照给事中刘懋的奏请，下令大量裁减驿卒，原本由驿站负担的一些差役转嫁给本地老百姓。崇祯皇帝认为，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以补充日益捉襟见肘的军饷。据《明史·魏呈润传》记载，通过削减驿站和驿卒，明廷一年下来，节省驿站银六十万两。当时，明廷还特别颁布了一些章程，针对从前弊端采用了一些新方法，“以疏民困”。但是，由于吏治几乎败坏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这些新制度不过是一纸空文。利用裁驿卒来补充军饷，无异于剜肉补疮。驿卒的薪水虽然少得可怜，但毕竟还是他们的一笔固定的生活收入。与老百姓到处流浪、生活无着的情况相比，驿卒的这点微薄收入也是很宝贵的。很多被裁减下来的驿卒无以为生，便纷纷加入农民造反队伍。李自成自身就是个驿卒，他的队伍中就有许多他当年的同伙。

崇祯二年十月，清兵分三路大举入侵，连续攻陷遵化、滦州、永平等地，直逼北京，大肆烧杀掳掠。崇祯皇帝仓惶失措，急令各地官兵火速勤王。清兵的这次内犯对明王朝造成很大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这次内犯虽然于次年春天撤退，但清兵对京畿一带大肆掳掠一



通，满载而回，给当地本已很微弱的经济又雪上加霜。

其次，这次内犯让辽东防务形同虚设，变得更为虚弱不堪。本来，在名将袁崇焕的领导下，辽东防务一度有所转机，并在宁远重伤了努尔哈赤。这次清兵躲过山海关，从遵化、蓟县一带南下，接连攻破许多州县。刚上任没几个月的遵化巡抚王元雅惶恐之下自缢身死，还有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战死在遵化，兵部尚书王浴因失利被下狱。京师戒严，全国上下一片混乱。辽东督师袁崇焕立刻率师增援，可是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最后竟将袁崇焕下狱处死。辽东总兵官祖大寿非常害怕，匆忙率领队伍返回山海关。如此辽东防务更加虚弱。

第三，各地将领响应号召率兵勤王，减弱了地方上的防御力量。勤王兵不断发生哗变，并且有些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增添了力量。当时，西到陕西、甘肃，南至湖广、江西，到处有将士赴京师勤王。山西离京师很近，山西巡抚耿如杞带领总兵官张鸿功以劲兵五千人最早赶到。按照军令，勤王兵到达第二天确定防地以后，才能领到军饷。耿如杞率兵赶到后，兵部命令他们守通州，第二天又调昌平，第三天又改调良乡。因防地多次变动，军士三天没拿到军饷。于是，饥饿的勤王兵特别气愤，于是就近抢掠，哗变离去。崇祯帝认为耿如杞和张鸿功治军不力，将二人下狱论罪处死。随之五千劲卒一哄而散，逃往山西，其中有许多人参加了起义队伍。甘肃巡抚梅之焕总兵官杨嘉谟率兵入卫，有位叫王进才的士兵率众哗变，杀死参将孙怀忠，逃回兰州。梅之焕只好回过头来镇压这次哗变，然后再赶往京师。等到他赶赴京师时，清兵已撤退到关外去了。参加哗变的士兵有不少人变成了造反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其溃卒畏捕诛，往往亡命山谷间，为群盗，贼势益张”。因此，镇压农民军的明廷军士，这时变成了反抗明廷的骨干力量。崇祯三年，李自成和农民军由陕西进入山西，就与这些哗变的军士有密切关系。

天灾人祸连续不断，小民百姓无以为生，若有人登高一呼，应者便会云集。各地“盗贼”叛乱的事接连发生，使明末社会渐渐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

这种动乱的日子自万历后期就已开始。那个时候，各地的白莲教徒活动十分猖獗，并且不时建号称王。到天启年间，动乱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天启二年，山东的徐鸿儒率白莲教徒起义，并建年号“大成兴胜”，设官建制，起义人数达到十多万。他们还一度把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切断，也得到四川白莲教的积极响应。这次起义虽然后来被镇压下去，但它给明王朝



二百余年的统治敲响了一次警钟。在天启皇帝在位的七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是接连不断。假如说，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的政治气候已经阴云密布，并不断传来雷声的话，那么，崇祯年间就进入了雷鸣电闪、急风暴雨的时期了。

崇祯帝即位那年，在陕西澄城发生过以王二为首的农民武装起义，从而拉开了以陕西为中心的明末大起义的序幕。

崇祯皇帝即位当年是天启七年，陕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澄城及邻近的白水县原本就地薄民穷，多年的旱灾迫使老百姓大批流亡，使得这里的大片土地荒芜。明朝官府不仅不对老百姓进行赈济，反而不断向当地的老百姓追逼钱粮，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澄城知县张斗耀就是这样一个善于逼钱粮的地方官。这年本来是个灾年，张斗耀秋后仍继续向饱受饥荒之苦的农民追逼钱粮。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满腔怒火的饥民冲入县衙，杀死了澄城知县张斗耀，后来逃到山里，聚集山中，继续与官府对抗。饥饿的农民纷纷加入抗议队伍，人数越来越多。王二第一次与官府抗衡时，他带领的数百人“皆以墨涂面”，意思是让官府找不出造反的人是谁。王二不是胸怀大志的人，他只是劫掠官府，抢夺仓库，以求一饱。他们在蒲州和韩城一带到处劫掠，并一度攻破宜君县城，并将狱中的犯人全部释放，一部分犯人也加入到了王二的队伍中。当时在陕西任巡抚的是胡廷宴，年老庸惰，特别讨厌别人向他汇报农民造反的事。各县派人向胡廷宴报告农民叛乱，他甚至命衙役将通报的人痛打一顿，说农民造反兵不过是一群饥饿的群氓，不久就会自散。后来农民造反的规模越来越大，胡廷宴这才重视起来。他自己吓得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便说是边兵带头暴动，要延绥巡抚岳声和来处理。岳声和尤其害怕别人说“边兵为盗”的话，把责任又都全部推给内地。两边巡抚互相开脱隐瞒，使事情的发展未能得到及时控制，最终致使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终于成燎原之势，熊熊燃烧起来。当时天下承平日久，突然之间农民起来造反，人无固志，官府懈怠，这给农民军的初期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王二造反如同在遍布干柴的陕西大地放了一把火，火星溅到之处便烈焰顿起，于是很快便呈现出烽火连天的局面，越发不可收拾。

同年冬天，府谷县农民王嘉胤伙同杨六郎、不沾泥等起义，先是到处劫掠富家粮财。地方官派兵丁前往捕治，他们便武装反抗，遂“聚为盗”，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不久王嘉胤和王二汇合一起，兵力达到五六千人，在陕北的黄龙山一带活动。

于崇祯元年起事的农民军有许多支。如，高迎祥起事于安塞，自称“闯



王”；王左挂起事于宜川，与他同时的还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王大梁起事于汉南，自称大梁王，很快聚集了三千多人，攻克了陕西的略阳，并且曾一度逼近汉中府的所在地南郑县。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陕西各地的农民起义军更是数不胜数。据明末清初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队伍不下一二百股，小的有几百，上千人，大的上万人，甚至达到数万人。与此同时，在山东等地也发生了许多农民起义，由于当地驻军较少，因而哗变的兵士也较少，起义的规模远不如陕西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紫金梁、神一魁、神一元、混世王、老回回、闯塌天、过天星、满天星、蝎子块、上天猴、独行狼、点灯子、整齐王、黑煞神、乱世王、二郎神等等，难以详举。

也就在此时，号称八大王的张献忠和号称“闯将”的李自成都拉起了队伍，投身到起义中来。